

世·界·名·人·文·學·



明月中天
拜倫傳

湖南文艺出版社

取·書

明 月 中 天

拜 伦 传

〔湘〕新登字002号

明 月 中 天

【日】鹤见右辅著

陈 秋 帆译

责任编辑：江 声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汨罗市印刷厂印刷

(原湘人版)

*

1981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92年2月新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148,000 印数：1—14,000

I S B N 7—5404—0884—4

1·704

定价：3.30元

丛书出版说明

人民大众数以千年来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社会日益进步和完善。在纷杂繁复的世界历史舞台上，出现过许多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边，促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历史人物。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人的同时，从来也没有否定个别伟大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他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旨在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了解某些世界名人的生活经历，探索其成败关键，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and 养分，作为生活道路上的良师益友。这套丛书还可以帮助读者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锤炼意志，陶冶心灵。但是，名人远非完人，且其时代、环境、教育及才智亦各有异，正确的态度，应是取其所长，弃其所短。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传……”古人对人之教养尤为关注。

幼童及青少年有如大自然树木，栽种之后，必除草莠，施肥水，修枝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幼苗经培育之后方

能高耸入云、苍劲挺拔之林，蔚为壮观。现代人望子成龙心切，此乃人之情理也。《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的编辑希望通过人世间出类拔萃的才子能人在人生旅途的成败艰辛，以及他们对人类卓越贡献的活生生事例，赋予青少年无穷的智慧和启迪，魅力，追求，上进，为华夏增辉生色，为中国人争气争雄，出几个诺贝尔，几个达尔文，几个托尔斯泰……此乐何极！十一亿民众之中华需要诺贝尔，需要托尔斯泰这样的英才，一百个，一千个也不会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我们美好而祥和生活的今天，更需要人才，更需要智者，更需要强民富国之精英。我们希望这套书成为青少年爱不释手的书，也是望子成龙家长的最佳选择。

俄国文学大师高尔基生前十分重视传记文学的撰写和出版工作。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就曾设想为青少年编辑、出版一套世界名人传记文学丛书，并聘请世界知名文学巨匠罗曼·罗兰、威尔斯等人亲自执笔。1916年12月，他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撰写一部贝多芬传。信中，高尔基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成年人不久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民族都曾经有过，——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有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了。”

高尔基亲自编辑丛书的愿望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33年才得以实现。近60年来，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从未间断，在本国及世界的读者中赢得了声誉。

我们这套丛书将包括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活动家、文学艺术家及其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人物的传记。而这些大多数又是由知名文学家所撰写，文笔优美，叙述生动，读后不仅使人精神振奋，艺术上也可以得到美的享受。本丛书计划分辑出版，每辑12本，衷心希望广大读者、翻译家、作家都来关心这套丛书的出版，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编 者 1992年春

拜伦和鹤见祐辅的《拜伦传》

—

英国诗人乔治·戈登·诺艾尔·拜伦（George Gordon Noel Byron, 1788—1824）是举世公认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那些风雷驰骤、波澜壮阔的诗篇，在他生前便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他死后一百多年来也一直在全世界饮誉不衰。拜伦是伟大的诗人。然而，更重要的，拜伦是伟大的革命家。他站在他那个时代的战斗前列。他是法国大革命伟大理想的忠实继承者和捍卫者。他为了自由、民权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奋战一生。他坚决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和贵族寡头的反动统治。他揭露和声讨一切奴役本国人民、奴役其他民族的霸主和暴君。在“神圣同盟”瓜分和宰割欧洲的反动时期，他是欧洲各国进步势力反对“神圣同盟”的思想领袖。在意大利，他成了意大利革命政党“烧炭党”的重要活动家之一。在希腊，他被推举为希腊独立军一个方面军的总司令。最后，他为了

希腊的独立自由而死在光荣的战斗岗位上。正由于如此，歌德才说他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普希金才称他为“思想界的君王”。鲁迅先生曾坦然承认：他自己早期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和“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精神，都是从拜伦那里学来的。苏曼殊说：“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郑振铎说：“我们爱天才的作家，尤其爱伟大的反抗者。所以我们之赞颂拜伦，不仅仅赞颂他的超卓的天才而已。他的反抗的热情的行为，其足以使我们感动，实较他的诗歌为尤甚。他实是一个近代极伟大的反抗者！……诗人的不朽，都在他们的作品，而拜伦则独破此例。”这些话都足以表明：作为革命家的拜伦，较之作为诗人的拜伦，更为令人景仰，催人振奋。

当然，在拜伦的思想、生活和作品中鲜明地显现出来的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这也是无需替他讳饰的。

二

鹤见祐辅(1885—1973)是本世纪日本知名的作家和评论家。他的《思想·山水·人物》一书曾由鲁迅先生译为中文(选译)。他的这本《拜伦传》，似乎主要是取材于法国莫洛亚的那本著名的《拜伦传》(1931)，同时也酌采了托马斯·

穆尔等人所写的拜伦传记。不过，鹤见这本书决不仅仅是莫洛亚书的缩写。在不少问题上，作者都有自己的见解；此外，他还订正了莫洛亚书中的某些事实讹误。

我们认为，鹤见这本《拜伦传》的优点在于：作者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材料，对拜伦的一生事迹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对拜伦诗歌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也作了扼要的论述；叙事生动有致，文笔摇曳多姿，情趣盎然，风华掩映，能够吸引读者。它的篇幅不象莫洛亚书那样长，作为通俗读物是较为适合的。

然而，这本书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主要的问题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歪曲了、甚至抹煞了拜伦的革命家的面目。

对于拜伦一生中重要的革命活动，它不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就是有意无意地歪曲其动机，缩小其意义。

1811—1812年，英国爆发了名为“卢德运动”的工人武装暴动。反动政府出动军警，厉行镇压。拜伦于1812年2月27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国会演说，热情为暴动工人辩护，揭露和谴责英国政府的反动政策。这是拜伦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对拜伦这篇震烁一时的著名演说，这本书中竟连一个字也没有引用。而发表这篇演说的结果呢，据作者说，只是使拜伦得到了荷兰德勋爵等大贵族的赏识，使拜伦取得了走进伦敦“上流社会”社交界的“通行证”。这样一来，为暴动工人仗义执言的正义行为，就变成了个人追名逐利的“登龙术”。试问：这不是歪曲又是什么呢？

对拜伦支持暴动工人这件事，本书中曾两次提到，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多字。而对于同一年(1812年)发生的拜伦与卡罗琳·兰姆之间的爱情纠葛，作者花费了多少笔墨呢？四千多字！超过前者十倍！厚此薄彼，如此鲜明，这也可以看出作者兴趣之所在了。

拜伦在意大利的六年中间，曾经积极参加烧炭党的革命活动，并成为该党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从拜伦本人的日记和别人所写的回忆录中，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大量事实材料。如果传记作者本人也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那么，他对拜伦的这一段革命历史本来是应该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而鹤见这本书又是怎样呢？对拜伦的这些革命活动完全不提当然不行，于是，在几处地方蜻蜓点水式地提了一下，却又把拜伦参加这些革命活动的动机歪曲为谈情说爱谈厌了，想要寻求一些新鲜刺激。试问：如果这不是传记作者的阶级偏见，又是什么呢？

作者对拜伦与特瑞萨·归齐奥利的恋爱生活津津乐道，为之特辟专章。但是，对特瑞萨是烧炭党人这一点却绝口不提。特瑞萨的哥哥彼得罗·甘巴是烧炭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拜伦正是通过他们兄妹，才得以接触以至进入烧炭党的领导层，作者对此更是绝口不提。彼得罗·甘巴，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后来在希腊，都是拜伦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而鹤见这本书中对他的名字几乎没有提到过，偶尔提到时，也决不肯指出他的革命活动家的身份。

对于拜伦亲赴希腊、参加希腊独立战争这件大事，作者当然不能不叙述，而且不能不用专章来叙述。然而，拜伦究竟为什么要去希腊参战？照作者的解释，是因为拜伦不甘心作为诗人而老死庸下，他要“实行！实行！实行！”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受人崇拜的英雄。把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说成是拜伦去希腊参战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动机，显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现存的拜伦歌咏希腊的若干首诗篇，现存的有关拜伦后期生活的若干种回忆录，都可以驳倒鹤见的这种“英雄动机论”。

诚然，拜伦身为贵族公子，他的思想、生活和作品都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他的生平活动（也包括他的革命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他的私生活也放浪而不自检束。这些，都不需要也不应该“为贤者讳”。然而，在这本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传记读物中，作者一方面对拜伦的那些革命活动是如此惜墨如金，另一方面，对什么“随身骑士”啦，什么“滑脚落水”啦，什么“掉在苹果树下的一只拖鞋”啦，以及什么“我的男人当王八，你的男人也当王八”啦，却又如此笔酣墨饱，兴会淋漓，连篇累牍，一唱三叹。试问：如果这不是在展示作者自己的并不怎么高尚的趣味和情操，又是什么呢？

作者对拜伦抨击华兹华斯是大不以为然的。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出（或是装作没有看出）拜伦与华兹华斯之间的斗争首先是一场政治斗争，是政治上的革命派与保守派（姑且不说是反动派吧）之间的斗争，而力图把它说成是不同诗

风、不同诗派之间的斗争，甚至只是私人意气之争。而且，据作者说，1816年在日内瓦，拜伦接受雪莱的劝告，潜心攻读华兹华斯的“高雅温柔的作品”，大受感化，悔改并克服了自己原先的森严与暴烈，而复归于淡泊与平和。倘若事实果真如此，拜伦既已在1816年幡然憬悟，觉今是而昨非，皈依到华兹华斯的门下，那么，为什么他在1818年以后所写的《堂·璜》中，又对华兹华斯作那样猛烈的抨击呢？作者如何解释这一彰明昭著的事实呢？

对于雪莱，作者似乎是赞美备至；其实，同样也歪曲或抹煞了雪莱的革命家的面目。在作者的笔下，雪莱或是神游物外，一尘不染，俨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仙灵；或是一派天真，混沌未凿，近乎婴儿或白痴。这和那个热情如火的革命预言家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凡此种种，绝非偶然。

拜伦毕生为自由而战，为反对专制暴政而战。鹤见也是一个醉心于自由主义而对专制政体颇有非议的人。从这方面来说，他的思想与拜伦有一脉相通之处。然而，拜伦生当十九世纪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神圣同盟”在欧洲肆虐之时，他挺身而出捍卫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和理想，揭橥自由和民权的旗帜，并终生为之奋战不懈，他便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革命战士。鹤见的时代比拜伦晚了一个世纪，星移物换，地转天旋，他却仍然株守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他毕生与革命毫无因缘，他对十月革命、对欧亚各国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持怀疑以至否定的

态度，这样，他就不仅不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而且势必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从这方面来说，他恰恰背弃了拜伦的革命精神。明乎此，他对拜伦那些光焰逼人的革命事迹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忌或歪曲，也就不足为奇了。姑且借用鹤见自己爱用的宗教术语来说吧：站在“小乘”立场上的自由主义学士文人，是无法真正理解站在“大乘”立场上的革命诗人和革命战士的。

三

译者陈秋帆同志将本书译为中文，是在四十年代初期，到现在已有四十年了。这个译本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都曾出版过。现在，我们对这个译本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予以重新出版。

书中引用拜伦的诗较多。鹤见祐辅把它们译成日文时，颇有误译或妄加增饰之处，中译者又据这样的日译文转译成中文，与拜伦英文原诗相比，几乎已面目全非。因此，书中引用的拜伦诗句，绝大多数我们都据英文原诗重新译出，使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较接近原诗，但并未严格遵循原诗的格律音韵。日文原书引用的拜伦诗句更多些，其中有一部分，中译者认为与正文关系不大，在翻译时略去未译，这些，我们这次也不再补入。

人名和地名的音译都改用现在的通译（多依据1979年版《辞海》和1981年版《世界地名词典》）。

书中出现的英国史、欧洲史以及欧洲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和地名很多，这是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阅读本书时的一项困难。如果一一加注，并非轻而易举。既然译者没有做这项工作，只好暂付阙如。这次我们所加的少数注释，只限于拾遗补阙，指出书中的某些讹误。

易 闻 实

1981年7月

中译本序

我没有留心过现代的传记学。我既不知道现在传记所达到的确实成就，更不知道对于它的性质、历史、风格和效能等，学者们曾经有过什么研究。过去虽然也偶尔读过一两本外国学者所写的《传记文学》一类的小册子，但是，隔了许多年月，那点儿知识，早已象月下远山的影子一般模糊了。现在来谈谈传记文学，不过仅仅拿个人一点微薄的工作经验作根据罢了。

我少年时期，虽然也曾经在“子曰馆”里念过一些时候的“人之初”，但是，大体上总算是受过新式教育的。而这种教育性质的不完全，是现在三十岁以上的人士并不难于想象的事情。在那闭塞的小市镇的学校里，我一面读着雇佣编辑家们编撰的课本，一面又哼念着那些唐诗宋文等古典著作。象外国少年人所容易得到的活泼有趣的名人传记等读物，是没有福气上眼的。因此，我在传记文学方面的兴味发生得很迟缓。可以说，直到近年来，才对于传记文学感到真实的爱好。

第一位启导我对于传记的爱重的，恐怕要算罗曼·罗兰先生。他那儿部名人传，我是用着对一册比一册更热烈

的情绪诵读过来的。他不仅教导我深切地了解和敬爱那些大艺术家、政治家，而且教导我去热爱那记述伟大人物的传记文学。实在的，因为诵读托尔斯泰、米开朗琪罗和甘地等人的传记时那种不容易找到比拟的感动，我才用很大的兴味和期待去诵读《罗兰传》、《雪莱传》和《伏尔泰传》。换句话说，由于罗兰先生的启导，我才有意地去搜读茨威格、莫洛亚等名手的作品。而从那些作品里，我吸取了生命和艺术的最醇美的液汁。

一本传记，或者说一本好的传记，对于读者所能够引起的兴趣和产生的实益，决不在一般的文学名著之下。试想，当我们披读着一个艺术家、思想家或政治家的生平记录，他所受的熏陶，所处的环境，他的思想和性格，行动和挫折，……一切内外的现象和经历，都浮雕般地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有的时候陪他高兴，有的时候陪他掉泪。有许多事情，会唤起我们的沉思；有许多事情，又催迫着我们振奋。我们不是在读小说，不是在听奇谈。我们是在接触一个真实的生命，一个活跃的灵魂，而从那里得到了最实在的教益。我们读罗兰先生的《托尔斯泰传》的时候是这样，读路德维希的《耶稣传》的时候也是这样。

好的传记，是真挚的艺术。它是最动人情思、策人奋进的一种读物。

*

拜伦这个异国诗人的名字，在今天我国知识界一般人的心目中，总不算是生疏的了。

有许多人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念过他那《哀希腊》诗章的译文。（而且，只要不是太缺乏热情的，就会发疯般喜爱它，直到长大了也不容易让那印象从脑海里消去。）而他毅然抛去诗笔，把资财和生命都献给反抗土耳其野蛮统治的希腊革命战争的壮伟故事，更是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所衷心钦仰和乐于称道的。但是，我们的文坛对这位革命诗人的介绍，却太过忽略了。《哀希腊》几章悲壮的诗歌，虽然译述得那么早，而且一再地烦劳了名家的手笔；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恰尔德·哈罗德游记》或《堂·璜》的译本，甚至连一本薄薄的他的诗歌译集都没有。关于这位诗人的生平，我们的研究家或介绍家，也一样那么吝惜。我们还没有出过一本他的传记，不管是写作的或译述的。因此，除了少数能够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以外，许多想比较详细地了解他生平事迹的读者，都不能得到满足愿望的机会。这种缺陷实在已经到了急待填补的时候了。现在这个传记译本的出版，多少可以算作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对于拜伦诗歌的价值，批评家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但是，他的诗作曾经震撼过欧罗巴的知识界，而且差不多形成了一个文学上甚至思想上的“拜伦时代”。在今天或稍后的世代里，他那些狂风烈火般的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具有着威力，能够激动那些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守旧势力的读者的心灵。大家只要承认这种已然的和可能的事情便够了。比较精细的剖析讨论，且让别的人在更适宜的机会